

从苏轼隐逸词解读宋代隐逸文化

霍建波 黄 镇

(延安大学文学院 陕西 延安 716000)

【内容摘要】本文选取苏轼具有代表性的隐逸词来分析其隐逸思想的发展历程,并对苏轼隐逸思想和宋代隐逸文化做了分析。文章阐述了苏轼“以儒治世、以佛静心、以道修身”的思想特点,说明宋代隐逸文化已经内化为人的心理需求,宋代文人更看重人内心的解脱与超越,这是对前代隐逸思想的继承和突破。

【关键词】苏轼 隐逸词 隐逸文化

中图分类号 J207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7-9106(2010)08-0098-03

中国隐逸之风源远流长而又异彩纷呈。从老子的“道隐”和庄子的“心隐”,到魏晋南北朝的“林隐”,从中唐白居易的“中隐”,再到北宋苏轼的“仕隐”,从而达到了一个极致。宋代文人尊隐羡隐的倾向是普遍存在的,而北宋文人往往是集官僚、政治家、文学家于一身的,这就使他们的思想受个人政治荣辱的影响很大。以苏轼为代表的北宋文人在饱尝险恶的政治风浪之后,不得不思考寻求一种有效的途径达到“出世”和“入世”的统一。

一、苏轼隐逸词流露出的隐逸情结

苏轼一生并未离开官场,也未真正归田隐退,但是并不妨碍他有浓厚的隐逸情结,诚如李泽厚所言:“苏轼一生并未退隐,也从未真正‘归田’,但他通过诗文所表达出来的那种人生空漠之感,却比前人任何口头上或是事实上的‘退隐’、‘归田’、‘遁世’要更深刻更沉重。因为苏轼诗文中所表达出来的这种‘退隐’心绪,已不只是对政治的退避,而是一种对社会的退避……是对整个人生、世上的纷纷扰扰究竟有何目的和意义这个根本问题的怀疑、厌倦和企求解脱与舍弃。”^[1](P153)]苏轼一方面是忠君爱国、报负满怀、学优则仕,谨守儒家“修齐治平”的思想,另一方面却在诗词中反复吟唱“归去”,俨然一个陶渊明式的隐士,其内心有着相当浓厚的隐逸情结。下面结合作品论述之。

(一)壮志难酬、仕隐两难——早期显露的隐逸情怀

宋仁宗嘉祐八年,在凤翔任上的苏轼赴长安,往岐山、过宝鸡,重游钟南山,遂作《南歌子》:“暗初疑夜,风回便报晴。淡云斜照着山明,细草软沙溪路马蹄轻。卯酒醒还困,仙村梦不成。蓝桥何处觅云英?只有多情流水伴人行。”^[2](P60)]上阙写出游途中晴雨变化,以及骑马赶路的轻快心情,下阙

转入叙事和抒情,着重叙写旅途劳顿以及对神仙之事的遐想。“仙村梦不成”“蓝桥何处觅云英”,借唐传奇《裴航》中的神话故事,写自己的幽渺情思,无情中透露出作者遁世隐居的思想,末句“只有多情流水伴人行”,在词人的想象中,山间流水可能与神仙境界是相通的,酷似陶渊明《桃花源记》的描写,以及张旭《桃花溪》诗中“桃花尽日随流水,洞在清溪何处边”的感叹,意在表达作者遁世的思想倾向。作者写该词时年仅28岁,却在少年时接受道家的思想,遁世的思想早已产生,只是作者的人生还未遭受很大的变故,仍然对生活充满积极乐观的思想,隐逸遁世思想只是作者人生思想的一个方面。再如其《沁园春》:“孤馆灯青,野店鸡号,旅枕梦残。渐月华收练,晨霜耿耿,云山摛锦,朝露漙漙。世路无穷,劳生有限,似此区区长鲜欢。微吟罢,凭征鞍无语,往事千端。当时共客长安,似二陆初来俱少年。有笔头千字,胸中万卷,致君尧舜,此事何难?用舍由时,行藏在我,袖手何妨闲处看。身长健,但优游卒岁,且斗尊前。”^[2](P300)]苏轼被罢杭州通判,调任密州太守,虽然满怀信心地说“致君尧舜,此事何难”,但面对现实的无奈,又不得不自我解嘲地说“用舍由时,行藏在我,袖手何妨闲处看”,去过一种“优游卒岁,且斗尊前”的生活,表现出作者壮志难酬的内心痛苦和仕隐俩难的人生抉择。

(二)紫云无路、见鹤惊心——反思自己劳碌仕宦生活

苏轼自从进京考中进士,踏入官场,可以说一直过着仕宦生活。但因为其保留对新法的见解,甚至攻击新法而得罪掌权者,后来又反对全部废除新法,又与当权者意见不合。所以其在官场上一直是不得信任,不得重用,生活也一直是郁郁寡欢。其《临江仙》词云:“自古相从休务日,何妨低唱微

* 本文为陕西省教育厅2010年专项科研基金资助项目“隐逸诗美学风格研究”成果之一。

* 作者简介:霍建波(1973-)男,文学博士,延安大学文学院副教授,古典文学教研室主任,文学研究所副所长,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古典文学、隐逸文化与隐逸文学;黄镇(1989-)男,延安大学文学院汉语言文学专业2008级学生。

吟。天垂云重作春阴，坐中人半醉，帘外雪将深。闻道分司狂御史，紫云无路追寻。凄风寒雨是骖骖，问囚长损气，见鹤忽惊心。”^{[2][P419]}“低唱微吟，仕人半醉”，这貌似一种安逸的生活，实则也只是作者聊以自慰的一种方式，郁郁寡欢、借酒消愁的原因是“问囚长损气，见鹤忽惊心”。长期以来繁忙的公务，每当看到“鹤”都不愿意为人驱使而心惊，觉得自己违背了自己当初归隐闲居的初衷。这也正如苏轼在《鹤叹》中所写那样：“驱之上堂立斯须，报以饼饵视若无。戛然长鸣乃下趋，难进易退我不如。”苏轼语意含蓄，那只特立独行，不受主人驱使的鹤，正是苏轼自己的化身，可以看到苏轼已经一定程度上厌倦了劳碌的仕官生活，向往田园山林的自由隐居生活。那样就能自由自在，不被人驱使，更不会无法主宰自己的命运，以至于发出“长恨此身非我有，何时忘却营营”的感叹，在幻想中去过“小舟从此逝，江海寄余生”^{[2][P815]}的生活了。

（三）淡泊功名、搔首赋归——隐逸思想的新阶段

苏轼被贬，初到黄州，写有《南乡子》：“凉簟碧纱厨，一枕清风昼睡余。睡听晚衙无一事，徐徐，读尽床头几卷书。搔首赋归欤，自觉功名懒更疏。若问使君才与术，何如？占得人间一味愚。”^{[2][P469]}在黄州的苏轼，深深地体会到了人情事故，世态炎凉。他处境艰难，住破庙、吃僧蔬、亲友散、落天涯，“不敢作诗与文字”，只能“读尽床头几卷书”，“搔首赋归”，并希望像《归去来兮辞》那样的文章表达“自觉功名懒更疏”的愿望。东坡看破了世人，看破了世情，也看破了仕情。他不再羡慕那些功名利禄，不在追求那些所谓“兼济苍生”。只希望能搔首赋归，至此东坡的隐逸思想也达到了一个新的境界。其《江神子》也是如此：“黄昏犹是雨纤纤，晓开帘，欲平檐。江阔天低，无处认青帘。孤坐冻吟谁伴我，揩病目，拈衰髯。使君留客醉厌厌，水晶盐，为谁甜。手把梅花，东望忆陶潜。雪似故人人似雪，虽可爱，有人嫌。”^{[2][P651]}该词表露自己希望像陶渊明那样隐居山里，“手把梅花，东望忆陶潜”，不再像以前苏轼都是较为含蓄地表达自己隐居的愿望，这次直白地表露，正可见苏轼是真的想要隐居，想要逃世了，这标志着其隐逸思想已经达到了一个新的阶段。

（四）隐退斜川、雪堂躬耕——转向现实的隐居之路

元丰五年（1082年），苏轼在黄州筑“东坡雪堂”，自号“东坡居士”。此时的苏轼躬耕东坡，漫游斜川，以待罪之身，过着亦官亦隐的生活。其《江神子》词云：“梦中事了醉中醒。只渊明，是前身。走遍人间，依旧却躬耕。昨夜东坡春雨足，乌鹊喜，报新晴。雪堂西畔暗泉鸣。北山倾。小溪横。南望亭丘，孤秀耸曾城。都是斜川当日境，吾老矣，寄余龄。”^{[2][P681]}“雪堂躬耕、东坡暮雨”是这首词突出描写的内容，苏轼直抒胸臆，追慕陶渊明似的归隐生活，也充分显示了自己躬耕雪堂的恬淡的心境，“梦中事了”、“只渊明”、“是前身”。而“暗泉鸣响、北山倾斜、小溪横流、亭山孤秀”就是斜川雪堂周围的景色，这正是一个理想的隐居场所，所以苏轼歌之“吾老矣，寄余龄。”希望能在斜川雪堂隐居，度过余下的光阴。苏轼此时是真的打算隐居了，他为自己选好了隐居之所，不想再奔波于仕途。至此，苏轼的隐逸境界已经趋于成熟，他不再像以前只是喊喊口号，而是转向了现实的隐居之路，过起了亦官

亦隐的生活。

（五）坦然淡定、无风无雨——超然、旷达的心境

苏轼虽然过起了隐居生活，但也并未真正离开官场。他把官场与山林调和起来，身在官场，心在山林，以哲学家的心境，淡然地面对人生的一切。他既是政府官员，是一个隐士，更是一个超越生活的智者，因为同时拥有了超然、旷达的心境，无往而不适，圆融无碍。其《定风波》词云：“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料峭春风吹酒醒，微冷，山头斜照却相迎。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2][P698]}宋神宗元丰五年，也就是东坡被贬黄州第三年，“乌台诗案”的教训使苏轼深刻体会到了仕途多舛和人生多难，但与此同时也扩展了东坡坦然宽广的胸怀。被贬之后，东坡吟诗雪堂，躬耕东坡，超脱了仕途和人生的限制。正如此《定风波》中所写，面对突如其来的风雨，行人无不狼狈不堪，而作者依然闲庭信步，坦然面对这些突如其来的“骤雨”，这也是作者对自己忧患命运的反抗和挑战。此时的东坡已不再受仕禄的驱使，纵使官场风云如何变化，在东坡那里都是“也无风雨也无晴”。《定风波》一词表现出苏轼隐逸思想的完全成熟，面对有象征意义的“风和雨”也能达到“也无风雨也无晴”的境界，这是何等的旷达！何等的超脱！是真正意义上的解脱。

二、苏轼隐逸思想与宋代隐逸文化探究

（一）苏轼隐逸思想与儒、道、佛的关系

苏轼的隐逸思想主要受佛、道思想影响。苏轼幼年既已从师张易简，深受老庄思想的熏陶，其诗词随处可见道家思想的影子。苏轼平生与很多诗僧交好，同时也颇受禅宗的影响。苏轼一直希望自己能像陶渊明那样过着隐居躬耕的生活，可他始终是“欲去又还不去”，从根本上说就是他还不能忘情儒家的所谓那套治世之道“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政治理想。儒家“修身”是前提，将“入世”的失意归咎于“修身”不善，在无法达到“治国、平天下”的时候，儒家讲究“修身”即“出世”，“出世”而“修身”，继而再“入世”以求达到“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理想。而这套所谓的儒家“治世”之道并不适用于东坡，东坡是宋代文人的典范，是一代大文豪，东坡自幼饱读经史子集，“学通经史，属文日数千言”。又受其父苏洵影响，“修身”已“至善”，完全可以“治国、平天下”的。但他始终处于宋代新旧两党的夹缝中，始终是政治上不得意，屡遭挫折。所以儒家那套的“治世”之道在东坡这里已经行不通了，而又深受儒家思想教育，无法彻底摆脱儒家思想的束缚，只能转而寻求另一种途径的“仕与隐”、“出世”与“入世”的统一。而“佛道思想”则是东坡最理想的选择了，道家讲究的是“清静无为、超然物外”，寻求的正是一种“与世无争”的理想统一状态。佛家则讲究的是“物我想忘、身心两空”，以求达到“静达圆通”的状态。东坡的佛道思想并不是为了避世，而是体现一种人生的追求，他吸收佛道思想中的有用部分并加以改造和利用，以构建自己一种理想的人生境界，因此他在《答毕仲举》中说：“学佛老者，本期于静而达。静似懒，达似放。学者或未至其所期，不为无害。”这里的“静和达”就是对世俗人生的一种超脱，是一种自由的精神境界，也是一种高层次的人生境界。

苏轼对儒佛道三家思想都颇有心得,他一生也颇受三家思想影响。佛家要求人以出世之身怀入世之心,道家提倡以入世之身行出世之事,而儒家则是以入世之身行入世之事。而苏轼思想独特之处就在于他将儒佛道三家的思想融合互补,兼收并蓄,为我所用。形成了宠辱不惊、进退自如的达观心境。儒家思想给他启悟,让他觉醒,一遇到挫折,佛道思想则是给他最大的慰藉,正是这种儒家积极用世的思想 and 佛道思想的融合使苏轼很快地走出人生的困境,形成了东坡“以儒治世、以佛静心、以道修身”的独具魅力和为后人所敬仰的人格。冯友兰也这样评价东坡:“苏轼自觉继承儒家入世思想,借佛道而超之,其奋厉有为,独立不惧、直道而行,归而不隐、老当益壮的人格魅力已然达到了‘天地境界’”。

(二)苏轼与宋代隐逸文化

所谓“文变染乎世情,兴废寄于时序”(《文心雕龙·时序》),任何一种思想都是在大的社会历史文化背景下产生的,隐逸文化当然也不例外。在历史上,隐逸往往是天下无道的代名词,社会动荡,文人士大夫无法达成自己人生理想继而避世隐居以求心灵上的宁静。宋代并非乱世,所谓“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3](P245)}。其实太平盛世也有隐士,如传说的尧舜禹时期,就有巢父、许由、善卷等高士,汉唐盛世也不乏隐士。宋代并非乱世,但是宋代人尊隐、羡隐的思想是普遍存在的。尤其是北宋时期,文人官僚生活中隐逸之风盛行,文人都喜欢以含有隐逸意义的词为号、为字、为书名、为居室园林之称,像欧阳修号六一居士、苏轼号东坡居士、李清照号易安居士、秦观号淮海居士,“居士”则是指在家修行的道者,不避酒肉也无须远离红尘亦可称之为“居士”。再者文人还喜欢把书名以隐命名,赵鼎臣的《竹隐畸士集》、李正民的《大隐集》。除此之外各个阶层的文人作品中都饱含着隐逸之风,如魏野《暮秋闲望》、

林逋《小隐自题》、范仲淹的羡隐之作《纪送太傅相公归阙》、黄庭坚的《登快阁》、司马光的《南园》等等。在宋代,隐逸是一种时尚,人们喜欢自称隐,也喜欢称朋友为隐,建个亭子也要叫个“隐亭”,建个园子也要叫“隐园”。世人总喜欢把自己和隐扯一起,似乎一沾上“隐”就光彩多了。

宋王朝也是一个“崇文抑武”的王朝,到苏轼年代已经是一个相当成熟的文官制度为基础、君主专制和中央集权强化的封建王朝,这对赵宋王朝的文人有很大的发展空间。但就是在赵宋王朝儒释道三家思想开始在思想层面上有机的融合,他们的教义从注重外部事物转向注重内心的修养,使儒家“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等这些非此即彼、不可调和的处世方式和传统价值观在宋代士大夫这里开始整合定位。隐逸文化发展到苏轼这里,“把隐逸行为内化为对人生终极归宿的追问,对生命价值的探索,他看重的是人生内心的解脱与超越。”^{[4](P188)}可以说,苏轼不同于以往文人单纯地避世山林、独享幽居之乐,而是积极入世,亦仕亦隐,并涉及到对人生终极归宿的考问。儒家积极用世、道家任其自然、清静无为、佛家静达圆通的思想使以苏轼为代表的宋代文人能够超然地面对人生得失荣辱,这也表明宋代文人的隐逸心理已经远远超越前代“仕与隐”的对立矛盾状态,进入了更广阔的空间领域。这正是宋代隐逸文化不同于其他各个时代的重要特点,也是宋代隐逸思想最富有特色和魅力之处。

参考文献:

- [1]李泽厚.美的历程[M].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1.
- [2]叶嘉莹主编.苏轼词·新释辑评[M].中国书店 2007.
- [3]陈寅恪,邓广铭.宋史·职官志考证序[M].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0.
- [4]霍建波.隐逸精神和传统文化[M].光明日报出版社 2009.

(上接第 93 页)努力发现山水之美,如支昙谛《庐山赋》:“嗟四物之萧森,爽独秀于玄冬。美二流之潺湲,津百川之所冲。”帛道遒《陵峰采药触兴为诗》:“连峰数千里,修林带平津。云过远山翳,风至梗荒榛。茅茨隐不见,鸡鸣知有人。闲步践其迳,处处见遗薪。始知百代下,故有上皇人。”徐公持认为:“此诗所创造意境极为优美,感染力甚强。后世诗人描写山野乡居朴素生活场景者不少,帛道遒实启其端。如唐代顾况《过山农家》‘板桥人渡泉声,茅檐日午鸡鸣。’温庭筠《商山早行》:‘鸡声茅店月,人迹板桥霜。’此等写景传颂佳句,盖皆自帛道遒诗中化出。”^{[3](P548)}可见,即使在释子眼里山水也逐渐成为了独立的审美客体,不再具有意识形态的色彩。至南朝山水基本上摆脱了玄风的影响,真正独立为审美客体,最终崛起为盛极一时的山水诗。其间颇有贡献的是谢灵运,谢灵运的山水诗虽常被讥为拖着玄言尾巴,却毕竟开拓了新的诗歌领域。而

且谢灵运对待山水也更多的是抱着玩赏的态度,如他在《山居赋》及自注中说“此焉卜寝,玩水弄石”,“还回往匝,枉渚员峦。呈美表趣,胡可胜单”,“横波疏石,侧道飞流,以为寓目之美观”,“往反经过,自非岩涧,便是水迳,洲岛相对,皆有趣也”。可见《山居赋》中的一些章节,虽然阐发了佛道思想,但面对山水时谢灵运注重的还是其形式美感,在一定程度上,把山水当作了独立的审美对象,捕捉到了山水的美感和趣味。梁代陶弘景《答谢中书书》将所见之景与谢灵运笔下的山水描写相比较,说“自康乐以来,未复有能与其奇者”,实际上是自觉地继承了谢灵运的山水审美,并明确提出“山川之美,古来共谈”,较为彻底地确立了山水独立的审美价值。

参考文献:

- [1]范晔.后汉书[M].北京:中华书局,1965.
- [2]沈约.宋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4.
- [3]徐公持.魏晋文学史[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9.